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春秋史笔】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下）	高文谦
【亲历者言】	我的文革经历——徐友渔采访录	阎长贵
【书刊评论】	文革第一个冬天的血色浪漫——评胡发云著《迷冬》	朱嘉明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春秋史笔】

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下）

• 高文谦 •

（上接 z k 1 8 0 2 b）

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

习近平上台之初，人们普遍对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习仲勋那样开明，解决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带领中国完成宪政转型。但是，习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大失所望，上台后全面左转，举毛旗，开倒车，可以说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更有甚者，习近平还处处仿效毛，搞个人崇拜，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铺天盖地对任志强搞文革式大批判，虽无其名却有其实，被称为“十日文革”，习也落得“毛二世”的骂名。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试图对此作一分析评述。

习近平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机缘巧合的结果，几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于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当年，邓确定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这是邓对中共接班机制的一大创新，以防止他身后出现毛式的个人独裁。在这种格局下，江泽民成了“夹心饼干”——上有邓小平，下有胡锦涛，直到邓死后，这种局面才改变。其次，江派和团派相争，习成了最大获益者。江不愿让团派人马李克强接胡锦涛的班，遂如法炮制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邓小平之道还治胡锦涛之身，力推习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习仲勋形象开明，在党内口碑很好。第四，习本人善于隐忍藏拙，表面恭顺，与人无争。后面这两个因素，是习近平胜出党内强劲对手薄熙来的原因所在。

应该说，习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多年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逼近全面爆发的临界点——官场腐败已经使共产党丧失人心，薄熙来事件更让人们看到中共高层内斗的黑幕和丑恶；更令人头疼的是，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好景不再，这本来是六四镇压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现在由于经济形势全面恶化，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危及共产党的执政。习痛感“亡党”的危机，他不想当亡党之君，红二代的“红色江山情结”也不允许共产党亡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有所作为，寻找挽救之道，如果还像胡锦涛时代那样“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那将是死路一条。

这种危机感并非习近平所独有，而是薄熙来事件后中共高层的共识。人们普遍对中共高层听任习上台后大力集权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危机感，使得党内高层容忍了习近平集权的做法，同意改变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局面，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而习近平则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反腐抓权，摆脱老人束缚，树立个人威权。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隐”半个月，以退为进，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权应对危机，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层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毛泽东轻轻放过，开展的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只是“猫盖屎”，并没有真正触及要害问题，清算毛的历史罪责。毛仍然是中共神坛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执政的指导思想，不容任何挑战，是维护一党天下的镇国之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执政者为了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举毛旗，即使政治强人邓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换柱，打着毛旗搞改革开放。在邓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是“邓头毛身”的二元结构——邓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而政治架构则仍是毛建立的一党专权体制。“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邓思想和毛体制两者杂交的畸形怪胎。这种体制成了权力寻租的天堂，造成官场贪腐猖獗，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处，反而成为牺牲品，他们为官方宣传毛时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蒙骗，把毛视为他们利益的保护神和反抗社会不公的旗帜。这就是习近平上台时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土壤。

4 · 2 表面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

作为红二代，习近平本来就有崇毛情结，从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层民众中的能量。红二代虽分左中右，但他们最大的共识为毛是共产党的“正资产”，从政的红二代更是从捍卫红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为政治图腾和他们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尽管他们承接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事业，权力地位皆来源于此，但邓是个实用主义者，只干不说，也说不出来说出来就是对马列毛的离经叛道。所谓“邓理论”说到底就是三论——“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对治理国家虽然实用，但难登大雅之堂，处于“失语”的窘况。这迫使掌权的红二代从毛那里寻找执政的思想资源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挽救共产党，也需要把毛请回来作为震慑党内贪腐势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邓小平虚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符号，而要复活毛作为执政的话语权，一大罩门是如何为毛发动文革解套，因为否定文革是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基石。为此，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踪拳”，以“中国梦”开局，表面上毛邓并举，实则厚毛薄邓。他当中共总书记后外出视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区，向外显示他将继续执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与此同时，习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纪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颂扬毛的历史功绩，并率全体中央常委到毛纪念馆祭拜，后来又访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冈山。通过这一系列动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习近平手中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大棒；在为毛解套的同时，习把文革的幽灵也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从此魔咒上身。

4 • 3 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深得毛真传

习近平上台后，施政的突破口选择的是铁腕反腐，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一石两鸟：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丧失人心，必须大力反腐才能救党；同时通过反腐立威，塑造强人形象，慑服党内各派势力，集大权于一身。可以说，习在抓权立威和心术权谋方面深得毛的真传。他在他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时机，隐忍韬晦，与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实、与人无争的印象，宁可被认为平庸无为，也绝不像薄熙来那样锋芒毕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权，颠覆了十八大确定的习李体制。

习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抛开原有的党政系统，另起炉灶，以“小组长治国”，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头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中央一级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前不久又担任军委联指总指挥，把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在手里。不仅如此，为了彰显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他还把党章中规定的总书记只是常委会的召集人，改为事实上的“主席制”，强调总书记总揽全局，重回毛时代的以党领政，让分管人大、国务院、政协等部门的常委向他汇报工作，把总书记与常委之间的关系变为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

4 • 4 选择性反腐意在保党揽权

应该说，习近平的开局不错，使出反腐、亲民、集权“三板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反腐为习赢得不少民心，就连对他的集权，人们也多是给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权在握后能推动政治改革，完成宪政转型。可是，人们很快就看出习的反腐虽然声势很大，但治标不治本，在制度上毫无建树，反腐不过是为了保党天下，而一党体制恰恰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依旧，非但阳光法案迟迟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间活跃人士抓进监狱，反腐作秀已经难以再吸引一旁看戏的民众；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官员也看出习反腐并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选择性反腐，是为了抓权，扶植自己的人马上位，不过慑于反腐的威势，他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启动政改，相反还在政治上开倒车，批宪政，镇压民间活跃人士，开展舆论斗争，禁锢言路；在抓权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制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新四人帮”之说，硬把挡路的江派、团派绑在一起打。

当然，习这样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韬晦避嫌，没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坛的不是江派，就是团派；而他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按“台阶论”提拔自己的人，缓不济急。对习来说，江派人马虽然占据要津，但更大的威胁却是有年龄优势的团派，经过多年经营，遍布省部级，形成地方包围中央之势。习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在党内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团反扑过来，他的结局不妙。

4 • 5 仿毛凸显缺乏政治智慧与能力

在反腐抓权的同时，习近平重拾毛这把刀子，对毛亦步亦趋，不仅在抓党治军中频频引用毛的语录、照搬毛的做法，如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古田会议；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欢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语，如“老虎苍蝇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习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样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凡此种种，成为习执政的一大特色，让人感到毛时代又重新回来了。

习近平举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虑外，凸显他缺少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尴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灵。习近平这批红二代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毛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血缘关系；文革是他们思想成长定型时期，有着他们的青春情结，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这种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结和文革思维定势，一遇机会便会表现出来。毛式文革话语已经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他们执政模式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习的执政思路 and 手段不可避免地带有毛时代的印记，散发着文革的气息，不久前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4 • 6 搞个人崇拜走火入魔

习近平一旦为毛招魂，自诩是毛的传人，事情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被毛的幽灵牵着鼻子走，惹祸上身，陷入毛式文革陷阱而不能自拔，搞个人崇拜就是他上台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习上台伊始，他的团队就利用人们对他反腐产生的好感，开动整个宣传机器为他造势包装，铺天盖地，越吹越神乎，俨然毛再世。国内媒体头条新闻几乎就是习一人唱独角戏，“习大大”之声不绝于耳，习的画像、宣传画随处可见，春晚成了歌颂习一个人的晚会，最后连《全民偶像习大大》、《东方又红》、《要嫁就嫁习大大那样的人》这样肉麻歌曲都出来了。不仅如此，彭丽媛也不甘寂寞，担任歌剧电影《白毛女》的艺术指导，中央党政军部门还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观看，这让人联想起文革旗手江青。

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走火入魔，有制度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个人崇拜是专制体制的内在需要，源于“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本质。在这样的体制下，党魁为了独断乾纲，必须证明自己是“英明领袖”、“伟光正”，否则无法服众。习近平浸润中共官场多年，很懂这一点，一上台就精心策划用现代传媒的各种手段为自己造势。开始时，他或许只是出于政治上集权的需要，但一旦走上个人崇拜这条路，就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被人阿谀逢迎。同时，这暴露出习自身明显的弱点——缺少自知之明，完全不知道这是在玩火，而是欣然接受，听之任之，沉浸在“颂歌盈耳神仙乐”的虚幻之中。而且集权和谄媚是一块铜板的两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至闹到这样荒唐的地步，还昏昏然没有察觉。

习近平上台后一直顺风顺水，无论是反腐还是集权，都没有遭遇党内重大挑战，即便是搞个人崇拜，人们起初也只是看在眼里，嘴上不说，顶多是私下提出质疑。但是，随着习近平不许“妄议中央”，加封自己“核心”，搞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党内高层终于联手对习说“不”。在各方压力下，习不得不下令对他的个人崇拜刹车。原因在于中共在这方面有惨痛的教训，党内高层都很清楚个人崇拜必然导致个人独裁专断，个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同义语。现在习这样搞，党内没有人有安全感，毛式文革噩梦是前车之鉴。这是习近平当政后遭遇的一大挫败。

习近平上台之初，我曾指出，他为毛招魂是在玩火，一旦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不仅将给国家带来灾难，也会给他本人惹祸上身，重蹈毛的覆辙。现在，不幸而言中。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登出“习面毛心”的封面，形象地勾画出习的真实面目，骨子里是小毛泽东，大陆坊间也广为流传“腊肉包子”之说。尽管有“挖坑”论者出来说这是有人给习抹黑，但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捧毛举动，恰恰说明是他自己给自己挖坑，现在自食其果，让毛的魔咒缠身，陷入政治上的困境，骑在虎背上下不来了。

4 • 7 集权有术，治国无方

本来，反腐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但习近平为保一党天下，不敢从制度上铲除腐败的根源，结果既挫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陷入和当年毛一样的困境，遭到整个体制的抵抗，到处都是敌人，“野心家、阴谋家”就睡在自己身边，没有一点安全感。习近平反腐已经成了烂尾工程，欲罢不能，后继乏力。不久前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姐夫”成为网络热词，更是让习反腐的道义正当性破产，进一步动摇了民众对当局的信心。反腐是习执政的唯一亮点，如果不了了之，习的新政也就寿终正寝了；而且会打虎不成，反被虎噬，遭到反对势力的清算。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心病。

习近平的麻烦还不仅于此。中国经济全面恶化，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实体经济一片萧条，而经济恶化又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这不能全归咎于习近平，而是江、胡两任多年来积累的结果。但是，习也有责任，上任后厚毛薄邓，一味抓权，不思改革，经济改革放空炮，空转三年，导致经济雪上加霜。毛的那一套搞政治斗争得心应手，搞经济就成毒药了，只能闹出“枪杆子救股市”这类笑话。习举毛旗唬人，虽然帮他很快站稳脚跟，但一旦大权在握，又陷入“权力任性”的铁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搞个人崇拜。在治国举措上，四面出击，内外树敌，到处“亮剑”，几乎得罪了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包括一些红二代）；对外剑拔弩张，摩擦不断，国际处境孤立，只能靠撒钱买朋友。

可以说，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所为，已经把中共这条船折腾得摇摇欲坠，令船上的人心惊胆战。不久前，那封署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公开信历数习上台后的种种过失，说出了人们心里所感，口中所无的话，迅速不胫而走，产生的效果可以和林立果那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讨毛檄文有一比，立刻成为原来蛰伏的党内外反习势力集结的一面旗帜。而且，这一事件也成为党内各方观察人心向背的风向标，暴露了习在政治上的软肋，如同当年四五运动让人们看清“四人帮”不得人心一样。

4 · 8 不得不为政治生存苦战

在各方压力下，习近平不得不有所收敛，原想通过搞个人崇拜为十九大人事布局造势的设想落空，阵脚大乱，“政治强人”的神话被破功。而且事情还没有完，在剩下的七年时间里，习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苦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习的个性是不会认输的，他会在暂时隐忍的同时，寻机反扑。围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势必有一场激烈的较量。历史给习的时间已经不多，他无法像毛那样随意改变党内规则，推迟党代会的召开。习能否在十九大上重新洗牌，打破两届任期的潜规则，遂其所愿，还是遭到各方联手逼宫，“最后领导人”一语成谶？我们可拭目以待。

习近平生逢中共红色王朝末世，他不想做亡党之君，作为红二代，想力挽狂澜，再造共产党，确保红色江山永固。可是，他昧于世界大势，违背历史潮流，无视人心向背，仅仅三年时间，就毁了自己的形象，把上台时的一盘活棋走成死局。究其原因，无论是习的个人素质，还是他的执政思路和治国模式，背后都有毛的魅影在作祟，这是习近平治国陷入困局的症结所在。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张，从毛的阴影走出来，而是继续开历史倒车，一意孤行，那么随着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局面将会更糟，不仅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习个人也会身败名裂，在历史上留下像张勋复辟一样的骂名。

结语：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

我在毛冥辰120周年时撰文指出“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现在仍这样认为。可以说，毛祸不除，国无宁日，文革式的折腾还会不断重演。

当前中国一切社会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而毛是这一体制的政治图腾。毛的政治遗产是中国社会转型成为宪政民主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不能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精神文化层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让全体国人知道文革历史的真相，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血腥、暴戾、恐惧的宿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

这就是我在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时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反思文革这场旷古浩劫所得出的结论。

□ 来源：《美国之音》网站

~~~~~  
【亲历者言】

### 我的文革经历——徐友渔采访录

• 阎长贵 •

（编者按：本刊在 z k 1 8 0 2 b 刊登了徐友渔对阎长贵的采访录《我的文革》，该文作为原始纪录，有许多粗糙和错漏之处，现刊登经阎长贵先生整理和订正后的采访稿，取代原来的初稿，以飨读者。）

时间：2014年5月4日

徐：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阎长贵老师。阎长贵老师是文革期间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他的亲身经历会非常地有启发性，有意思。阎长贵老师的专业是历史。除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有非常重要的经历以外，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这是新近出版的一本《问史求信集》。他不光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使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考证文化革命的事情。因为现在关于文化革命文章和书有大量的、错误的说法，很多生编硬造的东西。阎老师不满意。他写这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订正错讹。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只有一年。江青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一年之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阎老师打成“坐探”，关到秦城监狱，关了七年多，将近八年。当然他现在年龄很大了，仍壮心不已，在文革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阎老师当江青的秘书，像这样她手下的人，她是什么态度？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高官，还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贵妇人？阎老师会告诉我们他亲身的感受。

阎：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或者说戚本禹的推荐起了主要的作用。因为我在文革中在戚本禹的领导下工作，也替他或者说做了不少事情（如代他去接见群众）。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十八年，他和毛主席、江青都比较熟，关系比较好。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毛主席保健医生李志绥，他给毛主席看病要向汪东兴汇报，给江青看病要向戚本禹汇报。当时戚本禹和江青的关系，要好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文革还没正式开始，戚本禹代替田家英当秘书室主任，主要给毛主席服务。江青跟戚本禹讲了这样一句话：“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当秘书的很重要的一条戒律。我给江青当秘书后，她第一次和我谈话说：“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给你布置工作和任务。这是纪律。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所以当时江青评价田家英，说他一仆二主。就是说他除了给毛主席服务外，还和刘少奇有交往。

徐：一仆二主，这话很尖刻。

阎：田家英被打倒后，戚本禹接替了秘书室主任的工作。秘书室后来改成秘书局。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整整一年（从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365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江青还像一个正常人。她对工作人员还不像后来，据说后来她对工作人员，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她骂人我经历过，打我没见过。她骂人时说，你个人主义，你怎么不好，你给我滚。江青经常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就没有其他的了，她连星期天也没休息过。过去江青经常玩猴子、玩狗，还打扑克。而她在1967年那一年什么其他活动也没有，在这一年她就是搞政治，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而实际上她比组长还厉害，是不是组长的组长。她在文革小组专政。

徐：江青对你们工作人员如何？

阎：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而说江青难伺候，在1967年还不是很明显。

徐：“江青难伺候”，很多人都这样说，流传很广，你的感觉不是。

阎：我在那一年，我确实觉得她还比较正常。在去给江青当秘书以前。我就在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我是负责人。跟江青比较熟了。她选秘书的情况和过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没秘书。她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名叫孙立志，大家都喊他孙秘书。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江青说你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被化掉。”当时不是流传着这样一种对大学生的说法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江青说我“没被化掉”，这是对我很高的评价。我当时不知道江青这样说的真意是什么。我跟孙立志同志说：“谢谢江青同志。”在宣布我当江青秘书，戚本禹并把我送到江青住的钓鱼台11楼（江青的代号“11楼”）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江青不理我。作为机要秘书，我管收发文件，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要通过警卫员交给我，再由我登记和发出。就是说，我不能直接接触江青。我不解其故。我问戚本禹这是为什么？戚说他不知道。我跟戚说，秘书就这样当法没点意思，还不如原来在办公室（16楼）给江青办信好呢。我很纳闷，十多天后，我又问孙立志，他心平气和地告诉我：“这叫试用阶段。”这样，我稍微懂得了一点。有一次在十七楼看电影时，康生夫人曹轶欧看到我，有点惊讶地跟我说：“你到11楼工作了！”我问觉得奇怪，我想在11楼工作和在16楼工作还有什么不同。直到一个多月以后，江青才和我第一次谈话，其内容我前面已说过了。

徐：那后来的情况怎样呢？

阎：我谈谈江青和我第一次谈话的起因。我在当江青的秘书前，一直在戚本禹领导下工作，他经常布置我这种事或那种事。我到江青那里后，她一个多月不理我，当然也没有向我布置过什么事情。戚本禹仍然有时布置我一些事情。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就是戚叫我做的一件事情引起的。在1967年一二月间，当时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也分成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两派斗争很厉害。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受到压制，有的都哭了。受谁的压制？戚本禹告诉我受汪东兴的压制。汪东兴说，中办机要局那一派已被打成反革命。秘书局一派和机要局那一派是一对“孪生子”。这也就是说秘书局一派也是反革命，因此受到压制。一天下午，戚本禹派我到秘书局去了解情况。

说到秘书局的情况戚本禹是很熟悉的。他在那里工作了18年，有不少要好的朋友，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工作。此时他还担任着秘书局的副局长。他为什么还要派我去了解情况呢？

显然他要利用我当江青秘书的身份。戚本禹派我去了解情况，我就欣然去了。我到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熟的几个人，听他们谈了一些情况。回来以后，我就写了报告。报告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了解情况是戚派我去的，当然回来我要首先向他汇报。我把报告拿给戚本禹看，他居然说：“我不管。”我说：“唉，怪了，你叫我去了解情况，你怎么不管呢？”他还是说：“我不管！”我说：“你不管，怎么办？”他问我：“你敢不敢把这个材料送给江青同志？”我当时也年轻气盛。我说：“我去了解情况我有什么不敢的！”那我就立刻从戚本禹办公室回到我的办公室，即从16楼回到11楼。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勾掉，光写江青，又重抄一遍（当时没有电脑），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江青看了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她说：“你说的情况可能是对的，我从别的渠道也听到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这是纪律。从今以后其它任何人不能再分配你工作或任务。”她看出了这个不是我个人行为，是别人派我去的。

徐：刚才阎老师讲的其中奥妙，我体会到了。这就是戚本禹派你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又要摆脱关系，说什么“我不管”。

阎：如果江青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正是戚本禹所希望的。这样他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这是戚本禹和江青斗法，戚本禹输了！

徐：事情很复杂。戚本禹的政治对手是汪东兴。江青也不便管。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毛头也不懂。所以她交代你当秘书应该怎么当。这看起来政治确实是件很复杂的事情。阎老师我问你，你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他虽然是第一副组长。但我们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伯达实际上是一个摆设，起的作用并不大。实际上江青有一点太上皇的味道。那据你的近距离观察，江青在文化革命中间跟其他的那些位高权重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这里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江青还是很尊重陈伯达的。因为毕竟是组长，她只是副组长（尽管是第一副组长）啊。1967年8月，陈伯达生病需要住院。江青叫医生把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来检查。理由是：“帅不离位。”医生说：器械很多、很重，很难搬来。没办法就只好住到住301医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徐：那陈伯达也是对权力很看重的人，那这会不会引起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阎：陈伯达有个绰号叫“老夫子”，他是个书生。这个人，应当说有学问。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的学问应当是比较深的。周总理称陈伯达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众所周知，陈伯达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陈伯达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陶铸在的时候，他是第五号人物，而陶铸被打倒后，他就是四号人物了。

江青地位也是非常高的，非常突出的。曾志，即陶铸夫人讲过，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这个地位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

徐：当毛泽东的老婆比政治局委员还重要。



阎：她在文革以前跟毛主席到广东去。看文件的话，政治局的文件，她都可以看。她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她政治局委员比常委权力都大。我跟你说，哪一个常委出去游玩，去休养，海南也好，青岛也好，要政治局委员陪同的？而江青到青岛，到海南去玩，政治局委员吴法宪陪同，有时还两个政治局委员吴法宪、李作鹏陪同。哪一个政治局常委有这个待遇？没有吧。江青的地位、权力、特权确实都很高。举个例子说，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陈伯达主持。第二天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徐：喔唷，我们都没注意到）。当时我看到也没觉得是怎么的。现在看来却是一个谜。但这恐怕是永远解不开的谜。这个谜现在也说不清楚。报道“参加接见会的还有陶铸”，而陶铸是四号人物，是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没法比的啊。中国是很注意这个名字排位的。（徐：我们党对排位是非常讲究的）对这个报道也没见毛主席提出批评。（徐：四号人物都是被“还有”）不仅正文这样说，还上了提要。不知这是谁出的主意。陶铸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是不是他？不得而知。

徐：阎老师根据你的讲述，江青处在那么高的地位，她的权力来源显然是毛泽东了。依仗她是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毛泽东要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是结党营私，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据你的体会和观察，她是哪一种情况？

阎：我看从总体上讲，江青主要是执行毛主席指示。文革中重大战略部署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制定的。江青自己也说（大意）：“从（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以后，我执行的都是中央的部署，毛主席的部署，或毛主席的指示，我没有自己的什么纲领。”陈伯达在常委会上公开讲，我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不过是个“刘盆子”。（徐：就是说他是傀儡）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以及康生都是看江青眼色行事的。

徐：康生跟陈伯达都是看江青脸色行事？

阎：对，在文革初期，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主席以外，就是康生。这大概是从延安沿袭下来的习惯。康生比毛主席小五六岁，他生于1898年，毛主席生于1893年。毛主席也说“康老”，这是一个习惯叫法。康生直呼江青其名，并不说明康生不怕江青，对江青不尊重。后来康生给江青写关于八大的中央委员某些人的名单时，信封上就写：“呈江青同志亲启”。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都听江青讲，她什么都讲，都敢讲，都能讲。她如果和陈伯达发生什么争论，她就会把陈伯达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他俩统一思想后回来，别人，包括康生都等着。我说江青在文革小组中专政，那是一点不假的。

徐：那江青跟总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总理的资格非常老，地位非常高，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照理讲，江青应该很尊重总理。但是好像反过来了，总理尊重江青表现地更明显一点。你的观察，如何？

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很多了。其中有个观点，说江青文革一开始就要打倒周恩来，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徐：那是怎么一种情况？

阎：1967年1月—1968年1月，我在当江青秘书的一年中，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他来以前总是先给我打电话。他说：“长贵同志，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我想到那里去一下。”

所谓休息就是睡觉，总理当然就不来，所谓工作就是看文件，总理就会来。我就报告给江青。在这一年中，我没有发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她总是说：“好，欢迎。”

有人生编硬造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在这方面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社会科学院一个名叫林青山的研究人员。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总理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总理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总理的态度，从根本讲，也是以毛泽东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毛主席经常敲打总理，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主席更极端。江青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打倒总理，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徐：应说明两点。第一点，总理对江青是格外的尊重，想见他都要客气地要征求她什么意见。但江青对总理也是格外的尊重，每一次总理求见（阎：不是求见，不是求见！），都是允许了的，没有什么犹豫，是吧？

阎：对。为什么这样？我有个考虑。总理为什么要找江青？因为二月逆流，就是1967年2月16号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以后，不是成立了一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嘛，这就是中央最高的议事和决策机构。这个会议谁主持？总理。商议问题，江青仿佛具有一票否决权。总理为了节约时间往往要和江青提前商量。（徐：事先沟通？）事先沟通，对。

（徐：江青不同意就不行？）我想是这样的。我是没当过兵的，我是个书生，我还代理过警卫员。1967年4月份，原来的警卫员孙立志查出有肝炎。肝炎不是传染病嘛，要离开首长。当时警卫局、办公厅，另给江青派了一个姓杨的人，做警卫员。干了一天，江青跟我说，我怕见生人。确实她一见生人，就出汗。她说你给我当一段警卫员吧。我说我没当过兵，我一点警卫知识都没有。她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徐：就是跟她出去）我不好推辞，就做了。我比江青矮一些。我给她披衣服都披不上。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见过总理不止一次坐江青的车，但没见过江青没坐过总理的车。为什么总理要坐江青的车？当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记得他们谈过什么了。我觉得就是总理要和江青商量事情。因为文革小组碰头会是总理主持，总理要预先和江青讨论和商量一些问题。但有一次总理说的

话，我记得很清楚。总理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具体事情我们来做。对这话，我倒没听到江青有什么反应。

徐：根据阎老师谈的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是江青位不高，但是权很重。另外一点，周恩来实际上是非常善于人际沟通的。他知道江青的特殊地位跟特殊权力，他在每次开会做决议之前事先要跟江青沟通，事情才办得好。是不是这样？

阎：我看是这样。大概确实是这样。

徐：总理跟江青之间其实是工作上合作的很好，而且个人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阎：关于江青和总理关系我问过戚本禹，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那是很好的，这是非一般中央领导人可比的。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他说这就证明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不敢在刘少奇面前、林彪面前发脾气。戚本禹跟我说这话，是文革以后了，但我认为是一个讨论江青和总理关系的很重要的视角。

徐：关于江青跟林彪、叶群之间也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阎老师，据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阎：我也看到和经验过江青和林彪以及叶群之间的关系。林彪和叶群，我见过他们来钓鱼台11楼看过一次江青。林彪来了后，就坐在会议室里，什么话也不说。也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这一次江青拿着毛主席写的一些字（A4那种纸）从楼上下来。选了几幅说送给林副主席，其余几幅说是送给老夫子陈伯达。林彪没表态，不吱声。叶群说了一句：“我们是一介武夫。”林彪没任何表示。林彪性格就是这样。（徐：那至少还是把架子端起了的。）恐怕不是摆架子，而是他的性格。（徐：林彪就是这样的人。）叶群巴结江青那可是很厉害的。她说“俺老林是紧跟主席的”。主席说怎么办，他就在主席的批语上画圈。

关于林彪签字。现在有文章披露，那是有人替他签的。专门有个人学林彪的字，替他签字。林彪身体不好，在我当江青秘书的这一年当中，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接见群众很多，还有观看文艺演出等。叶群经常打电话问我：“今天这个演出或者今天这个接见，江青同志去不去啊？”我问她“你去不去？”她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这些事情有时候我知道，我就如实告诉她；如我不知道，我就就去问过江青再告诉她。叶群有时还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那里如搞不到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对这类问题，我很烦，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还有点清高。这类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徐：你也不屑于给她传这些话。）江青有自己的管理员，专门给她和毛主席服务，她要吃什么东西还能搞不到啊！有一次叶群派林立果，乳名老虎给江青送来两个南方西瓜，北京的西瓜还没熟，那是南方的西瓜成熟早嘛，送给江青。老虎把西瓜放到我办公室里，他也坐在一个座位上，我跟他聊天。我比他大七八岁，他是1945年的，我是1937年的。我问他一句，他答一言，不问也不吱声，挺老实的，印象不错。（徐：当初的林立果还比较老实。）就我在的一年，我说不出江青和林彪关系是好是坏。说好，我举不出例子来；说坏，我也举不出例子来。但是江青第二任秘书杨银禄讲过，九大以前，江青告诉他，叶群这人点子很多，有些问题怕将来说不清楚，凡是我和叶群通电话，都要记录。他给我打电话要记录。我给他打电话，也要记录。我在的时候，江青没跟我说过这类话。至于总理打电话，汪东兴打电话，不要记录。（徐：江青要有记录就意味着她留了一手。留一手，是怕将来说不清楚啊。这就说明他们之间有芥蒂了。江青对叶群的有戒心，有很强的戒心）我在的这一年，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徐：阎老师，你在江青手下工作。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后来江青怎么就翻脸，就把你打成反革命？你也不会做什么反对他的事，你说说你这遭遇是怎么回事啊？

阎：大的背景是王力、关锋倒台。王力、关锋是1967年8月30号隔离审查的（徐：720事件之后。）关锋是我的老师。我1961年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红旗》杂志，分配到关锋那个组，师从关锋学习中国哲学史。

徐：关锋在中国哲学史界还是真有点功夫的，有点根底的。

阎：所以连冯友兰都讲，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他认为关锋的文章水平是最高的。

徐：所以你因为跟关锋有这种渊源关系，所以你倒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阎：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徐：那具体的？

阎：关锋被隔离审查后，江青跟我说，现在你在我这儿工作，我的压力很大。

徐：什么意思呢？

阎：因为关锋出事以后，我们单位，还有你们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都有人写我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为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是定时炸弹，我们不放心”，等等。我把这种材料，我都送给江青了；我也不能不送给江青，也不敢不送给江青。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是坏人啊，不一定是反革命啊！”江青说这句话，表明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我当时听了很高兴。江青不仅继续让我做她的秘书，还任命我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

徐：江青总不能因为你和关锋的关系，最后把你关起来。

阎：对，这是讲的背景。导火线就是当时北京某电影制片厂一个演员或者工作人员，给江青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很长，有上万字。我工作很忙，收发文件很多，电话也很多。这封信我分好几次才看完。她讲了历史上她也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还说她在文革中她受到冲击；还说她有一些存款，想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她给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显然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受的冲击。对这封信，我误会了。我误以为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她以及她这封信的内容都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对这信，我觉得很难处理，生怕处理错了负不起责任。究竟怎么处理？经过再三掂量，我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江青。我就给江青写了个条子附上，说：江青同志，这封信的内容中有您的名字。就送给了江青。江青拿到这封信第二天就找我谈话，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江青把那封信往桌子上一摔，怒气冲冲地大声斥责我：“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吓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封信，我说：“这封信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把郭沫若的《洪波曲》借来看看。”

徐：郭沫若有本《洪波曲》，在香港出的。很出名的。

阎：我确实把《洪波曲》借来看了。《洪波曲》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人士，有一部分去了武汉、重庆，有一部分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去延安的，但《洪波曲》并没有点人的名字，当然也没江青的名字。

徐：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阎：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徐：也就是说，江青正式用杨银禄取代了你，作为她的秘书？

阎：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自己。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今非昔比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时，也正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鬼使神差地让我这个“书呆子”从1967年1月9日的“座上客”，变成了1968年1月9日的“阶下囚”！

徐：那他们是怎么审查你的？叫你交代问题了吗，有什么问题呢？

阎：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慢而又强调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三个人的姓氏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我第一次听到。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说：“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会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当时实实在在把他们看作都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我感到我的思想跟不上江青他们，心绪很乱。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徐：是不是一直把你关押在那里，叫你反省和检查？

阎：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他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兀地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徐：关在秦城，就和关在钓鱼台大不一样了吧？

阎：我到秦城监狱以后，换了黑色囚衣，并被冠以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房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1～4卷第一个横排合订本）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1、2、3、4……以此来打发漫漫无际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在监狱中我有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而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呆的地方，记得恩格斯说过“单身囚禁是最重的惩罚”，蹲半年就可能得神经病；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我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提审有与人对话的机会。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

徐：在秦城监狱里，他们是怎么审讯你，追查你的问题的？

阎：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涯里，提审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大概是没有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不可能体会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处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看到浩大的太阳，浩大的天了。经过长达七年半的监禁生活，现在我极为渴望回到社会，回到民间。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苦工，也比独自幽禁在铁窗里强上百倍。

徐：好不容易脱离监狱，怎么都比在里面强得多吧？

阎：我要去的是位于湖南省常德的国营西洞庭农场。到农场后，不看天，不看地，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家写信。八年了，音讯皆无。父母想我，我想父母；还有妻子儿子想我，我……想着想着，潸然泪下，恨不能插翅飞到山东老家，立马见到父母、妻子和儿子。信发出，盼啊，盼到第十天，接到儿子写来的信——这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信，我真高兴极了。接着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全家人团聚了，老少三代，这是八年来第一次，这是八年来没有过的事情。父母、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还活着——活着，这是八年来他们

多么想知道而又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的事情。后来父母依依不舍地回了山东老家，我和妻子、儿子则在农场安了家。

徐：关于你的案情，后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说法呢？

阎：1975年10月“专案组”到农场宣布关于我的结论。

其中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说我“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徐：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

第二条结论说我包庇“516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吴传启、林聿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社会科学院）的十一、二级的干部。我当时的行政级别是22级，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包庇他们？他们让我签字。我觉得不能签。专案组又把江青搬出来，说这是首长给你定的性。其意思就是说，我们专案组也没办法。

徐：说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毫无关系的事情。

阎：第一条结论的根据就是我误送给江青的那封信。这封信确实跟江青没关系，是我误会了。我说，我送这封信如果影响了江青同志工作和身体，给我什么处罚都可以，但是说我陷害江青，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绝对没这个心。第二条结论是胡乱编造，妄加的。

徐：得到这个结论，你在农场的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阎：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提到覃正彦同志，我情不自禁地要介绍几句。覃正彦，1928年生，石门县土家族人，家庭出身下中农，1949年11月参加工作，任过乡长，石门县公安局局长，石门县委副书记、书记，参加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文革中作为石门的头号走资派被揪斗、打倒，其罪名有鼓吹“包产到户”、为右派鸣冤叫屈、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五六年后恢复工作。1973年1月任西洞庭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他在西洞庭农场任职8年多，是农场生气勃勃的时期之一，在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是湖南和全国的红旗农场之一。覃正彦，1980年调任桃源县委书记，1983年升任常德地区纪委书记，1988年退到二线，1991年退休。覃正彦，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我们党难得的好干部。而1975年11月我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论：“妄图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关押七年半后还要“留党察看一年”。因而农场党委和覃正彦也没法安排我到宣传部去工作了。当时农场党委准备安排我到场部农业科工作，我的邻居是农业科的曾副科长，他跟我说：“农业科你去不得，在农业科工作，不管风里雨里都要往分场跑，你一个书生‘耐不活’。”所谓“耐不活”，湖南土话，“受不了”的意思。我接受了我邻居的这个好心的意见，得到组织允许，到农科所学校教书，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农科所学校的校长。1978年农场党委和覃正彦还是调我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我发挥了一定作用，我给农场干部作了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好评；农场党委派我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地委宣传部留我参与写研讨会的总结。1978年9～12月，农场党委又送我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理论干部班）学习。这些都足见农场党委对我的重视，也说明我在农场的表现还可以。“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发自肺腑之言。

徐：粉碎“四人帮”之后，你的案子彻底翻过来了吧？

谈到农场，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的事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办”专案组又给我做过一次结论。在这次结论中，当然去掉了原结论中的第一条即“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但其余一条仍然没有撤销，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居然又给我加上无中生有的一条，说我反对周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地强加罪名，我断然拒绝在这样的“结论”上签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是我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我几次到北京要求平反，每次所需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我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而且更是莫大精神上的支持。这时，“中央一办”撤销了，他们管的案子都转到了组织部，组织部又把我的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党委书记林肖碭，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育英之子，林彪堂侄）于1979年9月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我回《红旗》杂志社工作——我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在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助我解决妻子和孩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据说是干部名额的千分之一），——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就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太老实了！”总起来一句话，我对农场党委和职工的厚爱深深感谢，永远感谢！

徐：谢谢阎老师，今天谈了这么多，都是很有意思的事。

徐：看来，农场领导和职工对你很不错啊！

阎：最后，我发几句感慨。在文革中，被分配到农场、农村和厂矿的人很多，所谓改造思想，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曾享受过我这样被关怀被照顾的待遇。在人性之恶发展到极致的那个年代，西洞庭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给了我心灵上的慰藉和温暖，令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

~~~~~

【书刊评论】

文革第一个冬天的血色浪漫——评胡发云著《迷冬》

• 朱嘉明 •

〔作者按：我与胡发云是同代人。文革时，他在武汉，高中生；我在北京，初中生。三年前，我们在维也纳做过长时间的广泛交谈，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文革”。那时我发现，发云以其文学家的艺术思维和气质，对于在文革中的整体认识和分析，特别是在诸多的历史细节上，竟与偏重逻辑、学术和历史思维的我，是那样的接近，甚至重合。〕

之后，发云赠我《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我连夜读完，唤醒了那个年代的许多记忆，颇受触动。最近，发云的《迷冬》将由台湾的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台湾版本，邀请我这个非文学中人写一个序言时，我接受下来。

因为，在一个轻浮的时代，像胡发云这样，以小说的形式还原“文革”的，特别稀少和珍贵。还因为，今年毕竟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不要说我们的父辈，即使我们这代人，也在老去和凋零。深化对文革的认识，实在是一份难以推辞的历史责任。）

1966年2月22日，北京气温零下27·4度，是自1949年至今北京的最低温度。至于文革的第一个冬天北京的气温，虽然没有直接的气象资料，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寒冷的。

此时此刻，以“红二代”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伴随著毛泽东在11月里的最后几次接见，迅速地由盛转衰。但是，文革却是方兴未艾。1967年1月，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风暴”席卷中国；2月5日，上海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虽然这个“新”政权形式仅仅存在18天，它却根本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政治格局。胡发云的《迷冬》，所写的就是这个冬天，只不过，它不是北京的冬天，也不是上海的冬天，是一个叫作“湖城”的冬天，一个省会城市的冬天。

文革爆发于1966年6月，此时的共产党执政十七年，距前清倾覆和五四运动半个世纪左右。在此期间，虽然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持续不断，与此同时，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酷斗争，也一天没有停止。

但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对精英阶层冲击甚巨，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特别是大众的生活方式，所谓“旧中国”特征依然顽强地存在，俯拾皆是。

原因十分简单：政权更迭，百姓未变。1966年的中国人口是7·5亿，城市化率约18%。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出生和生活于1949年之前。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维模式，还在历史的惯性之中，而且是越接近社会底层，越是如此。

政府可以重编教科书，却不可能把教师通通换掉。“共产党来了，几批人一杀，几批人一关，运动一个接一个，都是又好听又好懂的一些话，便将他们弄糊涂了。但是骨子里，还是旧社会那一套多，对于权威，敬畏甚于诚服。民间依然存在著传统的情感体系和利益选择方式。民间伦理常常重于正统意识形态。”

“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样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著。这些，都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他们更愿意看到每年的国庆日、五一劳动节，人民在自己的安排下，花花绿绿浩浩荡荡走过那个鲜花掩映的检阅台，喊著响亮的口号唱著豪迈的歌，一派歌舞升平欢乐盛世景象”。

但是，文革开始之后的不足半年时间，在第一个冬天到来时，中国社会的断裂性地“解构”，原本社会基础和纽带的毁灭性摧毁。这种现象，实为中国历史所少有。至少，自清军入关，历经三百余年，发生太平天国、庚子之乱、辛亥革命和对日战争、国共内战，都未曾发生。

中国社会的断裂性地“解构”，原本社会基础和纽带的毁灭性摧毁。

此次中国社会被彻底“解构”，是以将人与家庭分类和分裂为突破口的。而分类和分裂，则是基于“血统论”的鼓吹、强加和蔓延，进而成为强制性政治观念。共产主义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要实现“自由人共同体”。

共产党执政以来，镇压和剥夺地主和资本家，老百姓接受了。经过五十年代的土改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谓“剥削阶级”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偏偏在这时候，中国又进入讲阶级出身的时代。

文革初始，人和家庭，包括青少年和儿童，被划分为不同“类别”：即“红五类”、“黑五类”，还有处于中间的“灰五类”。“黑五类”就如同“当年犹太人的六角胸符”。这样的“血缘色谱”，赋予“红五类”对“黑五类”拥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杀权力。

这样的“血缘色谱”，赋予“红五类”对“黑五类”拥有天然的羞辱、甚至生杀权力。

于是，“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窗们，昨天还在一个篮框下‘打半场’或在一个床头前洗屁股，今天，一些人成为红色，一些人成为黑色。红色的，理直气壮豪情满怀地批判、羞辱或殴打黑色。黑色的，痛哭流涕或强装卑下地自我批判接受羞辱和殴打。而那些灰色者，必须真诚地赞同红色们的革命行为，并与黑色者划清界限”。

即使在五十年前，人类已经进入太空、电脑硬体和软体重大突破，互联网最初理论已经出现，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代表的摇滚乐音乐和思想，后现代主义美术风靡世界，各种新的哲学概念改变著人们思维方式。

所以，从“血统论”或者“出身论”出生的那个时刻，就是一种反现代文明的愚昧、陈腐和荒谬的非理性思潮，也有悖执著当所公开宣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文革的发动者，却可以将“血统论”和诸如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红色江山，世界革命，革命接班人的“理念”结合起来，构造成不容质疑的“真理”，人为造成社会成员与生俱有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可以天然地压迫另一部分人。

因为“自来红万岁”和“红色恐怖万岁”是不可分割的。于是，以“理性”外衣的非理性思潮，与非理性的年轻人结合，造就了超越法律和实施暴力的空前能量，山呼海啸般地撕裂原本坚固的传统社会结构，以求“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展现了“血统论”荒谬本质，解释了文革的“初始逻辑”，即发动文革和“血统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惨遭枪决。如今回过头看，没有“血统论”，文革实在难以发端，“血统论”确是文革的“第一推动力”。后来的历史不断告诉人们，“血统论”从来没有真正消亡，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影响著中国的演变。

在中国社会被彻底“解构”中，1966年夏天红卫兵主导的全国性“抄家”是一个关键环节。“抄家”的本质是以“革命的名义”对私人财产的洗劫。没有明文合法化，却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

小说主人公多多的家也遭遇了“抄家”的厄运，这一天，对多多家来说，是自1949年以来最恐怖和最耻辱的一天，而对多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在那个夏天，抄家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另类日常生活。

抄家的物件构成一大景观：金银首饰、中正佩剑、股票旧币、美军罐头、威尼斯玻璃器皿、法国红酒、照片图片，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也看不出用途的器物。甚至街道的下水道，经常被尚未烧尽的书刊字画契纸信件，还有珠宝项链银元金砖堵塞。

抄家一般发生在老城区，如果用执政党的“阶级路线”衡量，老城区的居民，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洋奴买办、帮会大佬资本家、旧时代的党政军从业人员，便是教师、律师、医生、会计、领班、店员，记者、掮客、画家、乐手、伶人、摄影师……再往下是小商、小贩、小房主、各色各样的手艺人、扛活的、拉车的、串街走巷收破烂的。

虽然经过了17年，这里居民整体世界观没改造好。对这样的人群，有一个语意不明但一听就懂的说法，叫“旧社会过来的人”。如果说抄家的功能是剥夺家庭积累的私人财产，那是不够的，更严重的是摧毁人格。

还有，伴随抄家，就是所谓的“红五类”抢占“黑五类”的民房，实现从剥夺非不动产演变到不动产。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庭被抄，又有多少家庭自我“抄家”，已经无从知道了。可以肯定，数量巨大，无从统计。

遍布中国的各类“批斗”、“游街”，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解构”。小说对“批斗”文博中学校文工团的灵魂林老师有不少文字：1966年8月的一天，在校红卫兵抄完林老师家之后，林老师出现在批斗会场。林老师被红卫兵判定为反动文人和特务。文工团的同学们对林老师从敬重、喜爱甚至崇拜，一瞬间变为蔑视和仇恨。纷纷揭发批判林老师各种反动言行。

林老师被皮带抽打，被扇耳光，被吐唾沫，被蹬到地上，那一脚很厉害。林老师抱著胸在地上扭动。与此同时，“打倒林某某”和“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不断，群情激奋，一呼百应。于是，那个“平日那特有的睿智、自信，还透著威严的眼神的林老师消失了，只有猥琐、怯弱，甚至是摇尾乞怜。多多见到这副模样的林老师，除了怜悯，更多是厌恶。”

当教师的地位和尊严彻底沦陷，文明体系必然瓦解。多多的舅舅经历了“游街”：那一头漂亮长发剪得坑坑凹凹，一只眼睛被打成只剩一条缝，脸上被戏剧油彩抹得桃红柳绿，上身还穿著一件女戏装，胸前挂了一块牌牌，上面写著“反动堕落文痞流氓”，名字打了红叉，让多多一下就想起了枪毙人的游街。

在那个岁月，“批斗”和“游街”是一种常态，在剥夺被害者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让更多人成为加害者和旁观者，没有怜悯心、同情心和罪恶感。社会断裂，因为公正和平等没有了。

实现社会“解构”，还需要摧毁历史记忆，至少让记忆碎片化。历史记忆是文明传承的载体。1949年至1966年，中国的政治运动从未间断，其根本目标就是摧毁人们对于过去因为教育和生活经验所累积的一切历史记忆，而最为彻底的是与历史记忆不可分割的人群的消失。

在小说中，巴洛克式的红砖小楼、文博中学的阶梯音乐教室，曾经是校友们做弥撒的场所，立式钢琴都见证了过去的岁月。最有历史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闻名遐迩的文博中学校文工团”。在林老师经历残酷的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之后选择自杀，这个团体其实已经瓦解。

接着就是这样的场景：红卫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宣布，旧文博文工团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支完全由红五类组成的、纯洁的、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有的人都为这掷地有声的宣言热烈鼓掌，包括大多数已经被无产阶级排除在外的团员们”。

自然，中国社会彻底被“解构”的过程，必须是挤压人们可能的精神空间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即文革之前的中国，思想资源比物质资源还要匮乏，铺天盖地的都是红色文化，即便在不多的几个宽松时期，无非是几本书、几部电影、几台话剧。

外国小说也主要是俄国的，话剧还是《雷雨》和《日出》；歌曲不过是《鸽子》、《星星索》、《舒伯特小夜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但是，中国尚能残存某些与世界和历史文明的联系。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突然出现过这样短暂的日子：很多新老外国片子，苏联电影周，法国电影周，阿根廷电影周，墨西哥电影周，甚至美国电影周，还有香港电影，出现在大城市。即使一些电影名字都是灰暗的：《阴暗的早晨》、《她在黑暗中》、《白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好看的书刊涌现出来，在一些旧书店的书架上挤得满满当当，五十年代初的，1949年以前的，俄苏的、欧美的、线装的、竖排的，还有右派的和早已从新中国文坛上消失了的了一大批旧时代作家的。价格也便宜，几毛钱就可以买一本大部头。

然而，共产党执政以来的这种宽松时光，没有等到文革，已经消失殆尽。没有多少同代人，像小说的多多，经历和参与了这段日子，且影响了未来的生命。在小说中多多的舅舅，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某条小巷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的陋屋，聚集过“鼯鼠一样的地下画家”、“做著明星梦的男女文艺青年”、“旧日舞厅的爵士乐手”、“退学赋闲的北大才子”、“靠海外接济的印尼华侨”、“没了公职的摘帽右派”、“风韵不减的国军军官遗孀”、“话剧院大导演”。

在那里，这一伙人开过舞会，朗诵诗歌，手摇留声机里放过唱片，争论现代音乐，排演西方戏剧片段，还不知天高地厚弄了一帮人排演起契诃夫的《樱桃园》。“对于多多来说，那是一个极有诱惑力又极富罪恶感的地方。是一个隐藏于这个社会深处的迷人又危险的洞窟。他们在一起说的话，唱的歌，看的画，穿的衣物，吃的东西或吃东西的方法，甚至脸上的表情都和外面不一样”。

然而，这样的空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空间，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来临之前已经死去，没有留下痕迹。

社会“解构”势必是家庭的解构，让人性没有得以栖息的最后场所。书中有太多的家庭从此残破。夏小布家，父亲自杀；秦珊珊家，母亲改嫁；多多姨家，名存实亡。舒叶、舒慧的父亲被打死，母亲随之而去。宫小华父亲成为右派，母亲离婚改嫁，只为了保全政治生命和孩子前途。

到了文革最狂热的时候，因为走火入魔的政治，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多年好友之间，同事街坊之间，都到了水火不容和翻脸地步。最残忍的，莫过于家中的子女死于非命，父母的悲痛和之后的漫长煎熬。

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到来之时，中国社会的“解构”已经基本完成，不仅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稳定机制被破坏，仁义礼智信荡然无存，而且在1949年之后所建立的红色等级制度也受到毁灭性摧毁。从此，中国再也回不到从前。

1967年春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来临的。但是，不论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似乎都失去了过年的兴致。在这著魔的年代和荒诞表相的背后，其实是人们自身的蜕变。人们以不可想像的“时速”，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

失去自我，来自恐惧。“血腥暴戾的八月，让他在酷夏中感到寒冷与恐惧”。其实，最大的恐惧是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的无形恐惧，心中自发的恐惧，不仅要说不说，还要不想。

所以，多多最惧怕的是对伟大领袖的“腹诽”。即使“腹诽”没有说出来，“在当时那种情势下，这是一个掉脑袋的问题”。“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一部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俄罗斯民谚：‘沙皇也要尿尿’。当他联想到，那个神一样辉煌神一样圣洁的领袖也会尿尿吗？”他被恐惧所笼罩。

我们审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是因为“阶级成分”、“出身”和社会关系而失去自我和不愿有自我。如果说处于优越地位的所谓“红五类”接受血统论，似乎符合某种逻辑，问题是处于被伤害地位的所谓的“黑五类”，其实也默认和接受了“血统论”，这个过程从煎熬到麻木，从违心到真心。所以，少有抗争，多有逆来顺受。在那个岁月，不知有多少人自称“狗崽子”，甚至甘愿当“狗崽子”。

问题是处于被伤害地位的所谓的“黑五类”，其实也默认和接受了“血统论”，这个过程从煎熬到麻木，从违心到真心。

小说中描述这样的班会，同学们各自讲述家史。几个“红五类”同学将一盆洗拖把的脏水和墨汁，几瓶广告颜料混合在一起，倒在一位右派女儿的头上，人顿时就变成了一团污秽的大墩布，她没管它，迳自走向自己的位置站住了，任凭污水和血水在身下淌成一片怪异的图画。

因为她一直拒不发言，便让她一直站在黑五类最前面。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点什么，做点什么。1966年12月初，“独立寒秋”宣传队招生时，使用了“我们热情欢迎那些虽然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但是能和家庭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战友们”。

仅仅如此，“战友”两个字改变了包括秦珊珊等人的生命轨迹。小说写到：196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同时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革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这篇社论，同时解放了她和多多，让“独立寒秋”的成员们陷入开心、激动和庆幸。全队学习讨论了这篇社论。许多队员听著就哭了，发言时也哭了。当天晚上演出，唱到毛主席的时候，又哭了。这是何等的悲剧，悲剧的特征是荒诞。

分明是受害者，听到加害者一句稍加缓和的说法，得到有前提的某种缓和性称呼或稍加“平等”的口吻，就心存感动，不能自己。那时，没有一个“独立寒秋”的成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批判“血统论”的社论如此珊珊来迟？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血统论”在这之前的历史功能还没有完结，还需要这个图腾。

在这本书中，只有一个时刻是美好的，还残存著某种可贵的幽默：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之前，在大串联期间，多多和夏小布乘坐在那条美国登陆艇，全船各色人等，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没有出现前一阵子任何场合人人自报家庭出身，或叱问对方的家庭出身的情况，更没有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气氛，所有旅客得以有了一个放松的“联欢会”。

一旦人们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只有麻木、卑微、低贱和苟且偷生。人们一旦麻木和卑微，人本该具有的人格和尊严就会破碎，沉默地接受各类羞辱、折磨和死亡，已经习以为常。那时，人们卑微到没有哭的权利。

多多对夏小布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有多少人比你要惨一百倍，从小就惨起，一直到今天也没看见出头之日，他们连哭都不会哭了……。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成年人，特别是女性常常寻求婚姻手段。

为了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成年人，特别是女性常常寻求婚姻手段。

秦珊珊母亲，前夫是国军军官，四十出头，看起来还不算老，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是那一条街上的美人儿。但是，决定再嫁，嫁了一个装卸工人，五大三粗一座黑塔一样，据说比妈妈还小几岁。秦珊珊母亲对女儿说：真是对不住你，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人们没有选择死亡的自由空间。夏小布和秦珊珊都曾经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最终将她们带回来的，竟然都是外在的力量。对夏小布，是多多和那条破旧的美国登陆艇；对秦珊珊则是母亲的改嫁和“独立寒秋”的招生海报。

许多年后，当秦珊珊以一个副局级官员的身分，讲述那张招生海报对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所谓的她的影响，似乎没有可能说清楚了。沙特在《沉默的共和国》说过：自由的本质是否定，是有勇气说“不”，因为说“不”是人最后所剩余的自由意识。文革最终造就了没有人敢于说“不”的社会。只有多多的舅舅以他特有的生活方式，离经叛道，背离文革的“规范”。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解构”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结束。“解构”本身存在自己的规律和逻辑。自文革的第一个迷失的冬天开始，迷失会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迷失的重要标志是迅速丧失记忆，丧失对与尊严相关的记忆。

小说用了很多文字描写“独立寒秋”成员们获得解放军军装之后的场景：那天晚上大家像被仙人之手点了一样，吹的拉的敲的唱的，都在一种亢奋状态之中。多多本人“也曾暗中羡慕过这种具有特别风采的服装，甚至做过有一天成为军队文工团一员的美梦，但是当他一旦知道自己并不属于这个营垒的时候，他不再对这种衣服抱有任何兴趣”。

但是，指挥合唱从来不张嘴的多多，竟然在最后一句，突然大声唱起来，加入到大家的声音之中去。这是何等的失态？解放军军装在文革早期具有强烈的“革命”和血缘谱系的象征意义。曾几何时，红卫兵不就是穿著这样的服装，殴打老师，羞辱同学，破门抄家的吗？难道一个特定的符号就这么快被忘记？难道原本的“审美”标准会也被彻底颠覆？

进一步说，人们迷失的逻辑结果是习惯于屈辱生活。自杀曾经是文革中的重要现象。其中的不少自杀为的就是一个尊严，是一种消极意义的抗争。小说中不乏自杀的记录。夏小布的父亲自杀很早。林老师选择了自杀，之前是和这位林老师可能有着情谊的一位留学美国归来的英文女教师。人们可能会对他们的自杀有所同情和遗憾，却缺乏的追溯造成自杀的社会原因的意愿。

人们会说，为什么不忍一忍？到了1966年的深秋，“自杀的高峰期早已过去，许多没有自杀的人，都为自己当时的怯懦庆幸不已”，剩下的是“好死不如赖活著”。在文革第

一个冬天之后，武斗尚未正式开始，师院两位原学化学的大学生，因调配炸药发生爆炸而死亡。他们被迫认为“烈士”，召开追悼大会，操场站满了人。

哀乐响起的时候，哭声一片。之后，建起了一座水泥纪念碑。两年后，这座纪念碑被铲平，尸骨不知去向。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一座皇家园林般的新型高校。没有谁知道，那条通往山上的花岗石台阶下边，栖息过两位青年的亡灵。何等悲怆的历史！

在文革的第一个冬天，不是没有“爱”，有亲情的爱，有友爱，有情爱。透过“独立寒秋”这个小小的群体，可以折射出来这些爱。但是，所有这些爱，在那特定的日子，都是与一种特有的孤独联系在一起，这种孤独的本质是隔绝了一切宗教意识，否定了人性之后的那种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之后的孤独。

这种孤独的本质是隔绝了一切宗教意识，否定了人性之后的那种失去自我，不愿有自我和不能有自我之后的孤独。

所以，“爱是如此忧伤”。多多和夏小布，在经历了身心的疯狂交融之后，不是实现了身心解放，接近自由，而是趋于猥琐。多多要比夏小布严重，他一方面，不希望他人窥视他们两人之间的私密，另一方面，通过梦遗，重温那个时刻。

多多“如同一个飘荡的幽灵，悬浮在自己和夏小布的上空。不久后他读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那个邪恶又可怜的克洛德副主教，但他知道，在自己和克洛德之上，还有另一个法力无边的力量。

这群附于“独立寒秋”的年轻人，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旗号下，有著青春期荷尔蒙的冲动，有著对理想的追求，经历了复杂的情感过程，相互依恋，悲壮、激动、伤感，有过热泪盈眶、默默饮泣和嚎啕大哭，音乐爱好和训练成为他们在迷冬中抱团取暖的媒介。

但是，他们，包括多多和夏小布，在那个充满迷茫、迷惑、迷失的冬天，终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青春是怎样被剥夺的，他们的学习权利是怎样失去的，他们是如何处于没有能力左右自己命运的状态。夏小布阅读了屠格涅夫《前夜》、《罗亭》、《贵族之家》，其文字宁静雅致，平淡中的诗意，悬念，适宜在无所事事的时候阅读是主要原因。

夏小布对《前夜》的真正兴趣是因为书中的“英沙罗夫对于叶莲娜来说是一个新鲜又陌生的人，就像多多之于夏小布”。其实，屠格涅夫《前夜》的这两位主人公和多多、夏小布相差很远。因为英沙罗夫是革命者，而叶莲娜是忠于爱情的叛逆者，两个人都是殉道者。

至于，“独立寒秋”的真正的主导者羊子与《牛虻》主人公有几分神似，都有一种刚毅又悲壮的男人英雄色彩。但是，二者终究本质不同。《牛虻》的主人公亚瑟在就义中证明了他的终极存在。而羊子始终没有冲破制度性束缚，没有这样的精神资源，最终很可能落到“三种人”的结局。

在文化革命的早期，对青少年冲击最大的小说莫过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多多是从舅舅那里得到心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己看，也在“独立寒秋”传阅。

但是，文革这代人实在难以成就约翰·克里斯多夫式的人物，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超越世俗和功利，更无法感受到宇宙间存在的那种神秘力量，并将这种力量转化为自身的生命动力。不要说“独立寒秋”的女生，就是多多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文革已经继续远去。人们还会不断地解读和分析这场革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从文革的始作俑者到所有参与者，最终都是失败者。文化革命早期的红卫兵，在完成冲击和解构社会之后，伴随上山下乡，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在与官僚妥协和重建社会秩序之后，他们也退出舞台。

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文革已经演变为纯粹的党内斗争，老红卫兵和后起的造反派组织很快被抛弃，群众运动不再。文革显现了中国式政治和权利的“虚无主义”本质。后来，这种虚无主义引发了一种弥漫性犬儒主义，不再相信理想和义正言辞的真实性，拒绝发出正义诉求和呼喊，甚至否定内心深处的良知存在。当文革结束时，社会各个阶层都为自己“活了过来”和“熬过来”而庆幸，将其当作自我安慰的本钱。上层人士弹冠相庆，底层人民为可以重新回到专注生计的日子而喜悦。大家都曾经是文革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曾经充当文革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多少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不作不为有所反省，当然更不会崇敬和怀念在文革中敢于说“不”和为说“不”付出代价的人。

大家都曾经是文革的参与者和追随者，曾经充当文革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多少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不作不为有所反省，当然更不会崇敬和怀念在文革中敢于说“不”和为说“不”付出代价的人。

文革的狂热转化为冷漠，理想演变为媚俗，甚至是自觉的媚俗。不知道五十年之后，“独立寒秋”的成员们聚会在一起，会怎样回忆文革的第一个冬天，每个人的记忆会有怎样的差别？也不知道，在今天的那个省城的广场舞中，红歌队伍中，街道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太中，可否有“独立寒秋”的成员？

帕斯卡说过：“我们打开一本书，希望遇见一个作家，却遇到了一个人”。是的，《迷冬》强化了我对发云这个人，一个同代人，一个朋友的认知，唤起我们共同再次面对文革历史的思考。《迷冬》是发云的文化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的时间跨度自1967年至1971年的林彪事件，那是一个充满中国式政治的动荡、神秘和暧昧的时期；第三部的历史背景是林彪事件之后，直到毛泽东去世，毛的夫人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华国锋执政，一批元老派重出江湖，最后落幕于1978年底的那一次历史性会议。文革虽有几次高潮，人民终于抛弃了它，文革江河日下，在分崩离析的末世中完结。我期待，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和读者期待发云的文化革命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 来源：微信号《苍山夜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